

张斌贤

张斌贤教育史研究文集



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理论界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理论界

张斌贤教育史研究文集

张斌贤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斌贤教育史研究文集/张斌贤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7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9843-3

I. 张… II. 张… III. 教育史-世界-文集
IV. G5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869 号

书 名 张斌贤教育史研究文集
著 者 张斌贤
丛 书 名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frac{3}{4}$ 插页 4 字数 37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843-3
定 价 72.00 元

出版说明

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是宣传思想文化领域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工程着眼于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优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扶持，积极为他们创新创业和健康成长提供良好条件、营造良好环境，着力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和名家大师。为集中展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性作品和有关重要成果。《文库》出版将分期分批进行，采用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12月



张斌贤

1961年5月生，浙江杭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曾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工作（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学类）副主任委员、“外国教育史”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等。主要从事教育史学、西方教育史等的研究。著有《外国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史》、《西方教育思想史》（修订）、《教育是历史的存在》、《教育与社会变革》等，主编、主持翻译著作多种。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优秀成果奖和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2012年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自序

本书收录了我从1986年到今年8月间先后完成的三十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已先后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仅有两篇本周刚完成的论文(即与王慧敏合作的《“儿童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和与康绍芳博士合作的《美国教育学界精英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机制》)虽已投稿,但尚未发表。在这些论文中,三分之二为我独立完成,近三分之一是与学生合作完成的。

在当下学术界,对大学文科教师与学生合作完成的论文常有议论,也颇有些微词。因此,有必要稍作解释。在2004年前,我几乎没有与学生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此后十年,我宁可费些周折向刊物推荐学生的论文,也不允许学生“借用”我的名义发表论文。原因很简单,无功不受禄,不敢掠人之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我才会与学生联合署名发表论文。一种情况是,论文的主题或题目、论文的主要结构、观点和结论是由我提出的,论文的定稿是经我之手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署名为第一作者。另一种情况是,学生论文的题目或主题或者是学位论文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我们团队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的内容,并且,论文一定是我读过并且提出过修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或编辑部要求我联合署名,我会署名为第二作者。

从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外国教育史专业硕士学位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之所以选了三十篇论文,也许与此有关)。从1986年7月任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至今,也已近三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作品集是我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对自己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尽管在大脑中类似这样的回顾和梳理已经进行了不知多少次。

回首这三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感慨良多。此时此刻,由衷感到语言的贫乏与无力,难以充分表达内心所有的所思所想所感。今年4月24日,因工作要求,我和本校教育史专业全体在读研究生进行座谈。在座谈中,我回顾了自己近三十年的求学、治学之路,得出的结论是:失误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遗憾多于满足。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内心的真实感受。

应当说,我的专业发展是非常顺利的,无论在求学期间,还是在任教期间,都是这样。我就读和服务的北京师范大学有着国内领先的教育学科,也一直是教育史学科的重镇。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和工作,学术的发展自有得天独厚之利。况且,在我就读期间和此后多年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北师大教育系的前辈和老师的眷顾和关照。尽管如此,年轻时由于少不更事、缺乏定力,中年时又因行政工作耽误多年,学术工作所取得的真正成就与前辈的期望、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及所拥有的客观条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无法不令我感到惭愧和内疚。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年届天命,相信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加上现有的各种良好条件,在未来的岁月中,通过不懈的努力,我还是能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这部作品集的编辑出版对我个人而言,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这部作品集得以出版,首先应感谢中华书局所提供的大力支持。还应感谢李子江教授、王晨副教授、孙益博士、陈露茜博士、康绍芳博士、祝贺博士、张乐同学和王慧敏同学等人所付出的努力。

本书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張斌賢

2013年8月15日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编 教育史学研究

浅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
浅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现实感问题	(10)
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	(18)
历史唯物主义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	(23)
再论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现实感 ——与赵卫同志商榷	(35)
略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43)
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	(54)
教育历史:本性迷失的过程 ——对教育发展的“另类”观察	(64)
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	(73)
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与外国教育史课程教材建设的“新思维”	(84)
整体史观:重构教育史的可能性	(93)
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	(107)
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机”	(121)
教育史观:批判与重构	(132)
冲破藩篱 探索新知 ——外国教育史研究访谈录	(155)

第二编 西方大学史研究

- 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特权 (177)
- 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年 (194)
- “施潘事件”与德国的学术自由 (214)
- 学术职业化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226)
- 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制度化历程 (238)
- 美国教育学界精英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内在机制 (248)
- 美国大学与学院董事会成员的职业构成
——10所著名大学的“案例” (262)
- 美国大学与学院的生师比和班级规模 (271)
- “大学发展不能摆脱历史”
——《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译介 (281)

第三编 美国学校教育史研究

- 圣路易斯市公立学校变革:1865—1880 (293)
- 赫尔巴特在美国 (310)
- “儿童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 (325)
-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概念及历史发展 (342)
- 美国公共教育种族隔离合法性的确立:普莱西案始末 (353)
- 奠定布朗案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美国黑人
争取教育平等权利的历程 (363)

第一编 教育史学研究

浅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当前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哪些重大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何在?这是我们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十分关注而常在议论的话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前辈和同志们。

一

史料建设问题。史料是教育史研究的根据和基础。当前,外国教育史史料在数量、品种、版本、国别等方面都严重缺乏,这直接影响到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受文化和学术交流、文字翻译和外汇款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加上许多人为造成的种种原因,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往往难以充分获得第一手史料和相关资料。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当前在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1. 以论代史。这几年在报刊上也登载过一些论及外国教育史的文章,但不少都是以作者个人主观的推论为主,缺乏有根有据的原始佐证。尤其一些研究教育思想的文章,虽然洋洋大观、宏论连篇,但让人读后却搞不清其中的主要论点究竟是作者的评述,还是阐发教育家固有的观点。

2. 观点移植。由于缺乏充分的最近和最新的国外学术研究文献,所以我们的教学或评论文章中不少观点还是数十年前别人论点的移植。举一例子,我们对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评价在20世纪50年代是全盘接受苏联教育史家的观点,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受其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缺乏赫尔巴特本人思想的原始资料(尤其是中文译本),因而容易出现人云亦云的现象。

3. 以偏概全。外国教育史料严重匮乏,直接导致研究工作难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我们仍以赫尔巴特为例,以往我们手头有关赫尔巴特思想的资料,无非就是尚仲衣先生翻译的《普通教育学》和张焕庭先生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中的赫尔巴特三部著作的节译部分。诚然,《普通教育学》是赫氏的主要教育著作之一,通过它可以大体上了解其教育思想,但问题是,其一,尚的译本中有许多翻译得不准确之处,而且他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其二,《普通教育学》乃是赫尔巴特三十岁时写的一部著作,属他早期思想的总结,而不反映他的全部教育思想。我们知道,赫尔巴特于1809—1833年在哥尼斯堡致力于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和教育实验。他的这些中后期研究工作所形成的思想,比《普通教育学》所提出的思想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后期写的《教育原理纲要》才是他教育思想最为完整的体现。因此,仅仅根据一部著作(虽然是很重要的著作),是很难对某一位教育思想家(尤其像赫尔巴特这类多产的和在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教育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的。

以偏概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对教育家教育思想资料的占有上,同样也表现于对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一国家、地区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资料的占有上。直至今日,我们对许多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重要原始史料掌握甚少或不成体系。例如希腊化时期的教育史料,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面的史料,我们都很缺乏。据我们调查,我国至今还没有裴斯泰洛齐、第斯多惠等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全集或文集,更缺乏系统的教育制度史料。这就势必造成以现有的范围很窄的史料来推论其全貌。可想而知,这样得出的结论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4. 分散经管。今天国内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单位很多,每家都想自己占有资料,为开展研究提供方便,于是各自想方设法去争得为数很少的资料,门路多的就多得,门路少的就少得或难得,弄得大家都很有意见。为什么我们不能尽快地建一个全国性的教育资料馆(或中心)为全国教育研究单位服务呢。美国过去的教育资料也是分散各地,没有全国性的教育资料馆,但在1972年6月成立了全国教育资料馆,并逐年拨款充实和扩大其规模,向全国提供有效

的服务。建立全国教育资料中心势在必行。

在资料问题上,我们应该自己着手进行史料的整理工作,并加快这方面的步伐。解放以后曾有些院校和出版单位组织力量翻译和编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杜威教育论著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等几本教育思想史料集,这些编译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们深感不足的是至今尚未看到一本有关外国教育制度史的比较精确、完整的资料书。可见,我们教育史资料的建设工作有待各方面加以重视并共同协作加以解决。尤其面对当前世界科技迅猛发展、教育改革日新月异、教育科学研究深入开展的形势,我们应当具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去加强教育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翻译等建设工作,这是使教育史学科迅速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走向振兴和发展的首要工作,它不仅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工作大有裨益,而且也将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

研究范围问题。在1983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上,曾有同志指出,现在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面太窄,可以说基本上属“欧洲教育史”或“西方教育史”范围,这个评价是公正的。尽管解放后一直在批判“欧洲中心论”,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在我们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基本上仍局限在欧美国家的教育发展史上。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德、意等国)的教育发展迅速,在许多方面在世界教育中起着领先的作用,并且通过殖民征服等方式广泛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教育发展,因而,在教育史研究中有所侧重,这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既然称之为“外国教育史”,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个地区。另一方面,因为历史研究除了整理、保存人类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观古知今的作用,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那些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相似性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教育历史。例如,研究曾经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接受殖民宗主国的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是如何改变本民族固有文化和教育传统的,这对于研究具有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历史的中国教育是有意义的,同时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要扩展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从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现状中逐渐摆脱出来,从而成为真正的“外国教育史”,有必要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增加一些新的章节和内容,有必要开始研究一直被忽略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的教育历史。

为了加深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开阔研究的视野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认为,开阔视野,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我们必须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史中摆脱出来。我们的教育史一直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它的制度以及关于它的教育思想为主要对象。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学校教育只是人类教育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事实上,在任何社会、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上,都同时存在着非正规的教育形式,它们在培养当时社会所需的人才方面,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古代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公共设施在对未来公民进行政治、道德、知识和审美的教育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还应研究历史上(特别是古代和中古时期)劳动人民的教育状况。因而,仅仅以学校教育来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是不能全面反映教育的历史发展的。

第二,我们必须从把教育看做一种社会机构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来研究外国教育史。学校一经产生,就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存在于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学校的存在、发展、演变,必然受到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表现在学校的制度和结构上,有时则反映在学校本身的组织形式上。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名称、组织等方面都受到中世纪后期的行会组织和寺院组织的影响,英国著名的兰卡斯特—倍尔制就是在工厂制度形式的直接启示下产生的。教育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如果不深入探讨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学校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化,就不可能深刻认识学校教育的本质。

第三,我们应当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外国教育史。不同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这是从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史实。每一民族的文化在不同时期总是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历史。在西方文化形成、发展中,先后受到东方文化如埃及、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东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一直在进行,如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日本、朝鲜的影响,等等。再就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而言,意大利文化曾

经是近代欧洲文化的摇篮,德国文化在其形成时期先后受到了英、法等国的影响,美国文化是在宗主国英国文化的模式上形成和发展的。只有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才可能从广阔背景下考察各国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才可能逐渐地摆脱欧洲中心论。同时,由于文化交流本身也包括了教育的相互影响,因而,在具体考察某一种学校类型或某一种教育制度时,只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才可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而在当前,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谈到某国的某种学校对别国的影响,或某一教育家对别国的影响时,只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这样,不但限制了对这种学校和教育思想本身的研究,也影响了对受其影响的国家的教育进行研究。例如,我们在谈到赫尔巴特对美国的影响时,往往只是简单提一下美国形成了一个赫尔巴特学派,建立了全国赫尔巴特协会等,而大量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如美国人如何接受他的影响,是机械照搬,还是有所改造?赫尔巴特学说在美国的影响造成了什么结果等等,都没有得到详尽的解答。因而,对于杜威为什么在20世纪初如此猛烈地抨击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教育等问题,就难以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第四,开展跨时间和空间的宏观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基本只是以时间为顺序的微观研究,这种方法自然无可非议,因为它反映了历史学科本身的一个特点。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方法,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在研究教育思想时,虽然也注意揭示各个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但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制约,往往只能“语焉不详”,这种情况在一些专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完全集中于一人、一事的微观研究,常常因为视野的限制而影响深度。因此,必须加强宏观研究,以弥补微观研究的不足。例如,如果我们把近代教育史上的“教学心理学化”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就可以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教育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发掘出他们思想中的共同和不同因素,以及相互之间的继承与发展联系。这样,教育家本人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成为思想潮流中一股涓流。再如,可以把欧洲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创立近代初等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制度的历程作为一个整体,使似乎孤立存在的教育事件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五,把教育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教育的历史发展受到文明本身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另

一方面,教育又是保存、传播和重建、创造文明的强大工具。因此,从教育与文明整体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外国教育史,这是极为重要的。在我们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虽然也大力强调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进步对教育的影响,但常常忽略诸如宗教、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等文明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因而往往不能全面和深刻地揭示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牢记教育与人类文明整体的相互联系,并加以深刻、全面的揭示,才可能使我们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三

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史,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特点,今后仍应继续坚持。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它不能等同、更不能取代教育史学的研究。

我们都认识到,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教育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外国教育史,除了独特的研究对象,还必须具有由一系列特殊的概念、研究方法、态度等组成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史学”。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外国教育史所应展示的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教育是如何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达到了它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甚至支配了它的发展过程。教育史与人类历史或其他领域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存在着共性,但毕竟是不同的,在探讨文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时,应当有所区别。换言之,教育史应当、而且必须首先是教育的历史。

这意味着,一方面,教育除了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状况的影响之外,还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证明这一点,就很难说明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发展,而英国学校却仍然保持着古典人文学科独霸课程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正如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受生产力等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样,教育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所受外界影响也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不应机械地照搬“生产力与生产